

114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

試題

考試別：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考試等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別：政經組（選試英文）、國際組（選試英文）

科目：中國大陸研究

呂岳老師解題

- 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為何？請詳細說明該機關的產生以及運作方式與功能，並評論其在中國政治體制中扮演的角色和一般民主國家有何不同？（25 分）

【解題關鍵】

1. 《考題難易》★★

2. 《破題關鍵》

- 一、經典考題，主要是思考政黨權力與憲法之間的關聯性
- 二、民主國家與中國式民主的權力差異比較
- 三、課堂上所補充的內容，如有印象能夠從中國共產黨的兩會之中去抽絲剝繭找到破題關鍵
- 四、中國式民主與西方民主制度的不同，亦為課堂上敘述過的重點

3.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2、3

4. 《命中特區》

114 年正課講義 pp.5-11、p.44、總複習 p.9

【擬答】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2 條、第 3 條的明文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大陸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負有制定法律、決定重大國政、監督憲法實施等法定職責。然而，從其產生過程、運作方式到實際功能來看，該組織制度的設計與實際角色顯示出中國大陸政治體制的獨特性，這樣的思考方式也與多數西方民主國家的國會體制存在根本差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透過分級間接選舉產生，而非全民直選。具體而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選出代表，而地方代表則是由選民投票產生。代表名額的分配以人口及行政區劃為依據，每屆任期五年。這種選舉制度在形式上保留了代表人民意志的外觀，但實質上人大代表多為中共黨員或其支持者，政治背景保持一致性且對黨有著較高的服從，只是這樣的方式與西方民主選舉產生的民意代表有著非常大的差異。全國人大會議機制則每年召開一次常規會議，由常務委員會召集，期間進行審議法案、報告與政策決策，會期約為兩週。在閉會期間，常務委員會代為行使部分職權，實為實際運作機構，具備日常立法與監督的功能。然而，無論是大會還是常委會，其議案的提出多由國務院等政府部門主導，人大委員或專門委員會所提案比例極低，顯示出人大立法的被動性與附屬性。

在功能與角色上，全國人民大會的職權包括制定與修改法律、選舉或任命國家主席、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及各部部長、審查預算與決算、決定戰爭與和平、以及憲法修訂與監督等。儘管這些職權範圍涵蓋了國家的立法與政策核心，但實際執行上往往扮演的是政治合法化與政策背書的角色，而非獨立審查或制衡機構，近似於所謂的橡皮圖章。在中國大陸政治體制中，全國人民大會是中國共產黨統一領導下的政治體系重要組成，其人事安排、議程設定、

法案內容皆受到中共中央的嚴格指導，體現出高度集中的政治控制方式。這樣的方式即對中共中央的政策決定提供形式合法化程序，而非自主審議與監督。相較之下，一般民主國家的國會，如美國國會、英國議會或德國聯邦議院等，不僅民意代表多由全民直選產生，也表現出多元政治立場與社會意見，並透過獨立的立法、預算審查、行政監督與彈劾程序對行政權力形成有效制衡。在法案審查與辯論過程中，議員可基於個人立場或選民需求進行質詢與修正，會議形式強調程序正義與意見衝突，反映民主制度中權力分立與透明問責的原則。相比之下，中國大陸全國人民大會的運作缺乏這種開放性與制衡性，其制度安排更多體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下的集權治理邏輯。

綜上所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雖名列憲法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但其實質功能卻更多是作為中國共產黨政策實施與政治安排的制度性平台。這一點體現在其代議形式的間接性、議案來源的集中性、討論過程的共識化以及代表構成的高度同質性。全人大並不具備與行政部門或執政黨之間的實質制衡機制，反而成為黨領導下貫徹政策、通過法案、任命人事的政治節點。這種政治運作模式與多數民主國家的國會制度形成鮮明對比，後者強調代議民主、多元監督與制度競爭，並透過政黨輪替與媒體揭露促進政治透明與權力問責。在中國大陸體制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主要政治價值在於提供一套合法性的框架，使執政黨的意志能夠通過制度化形式轉化為國家法律與政策，並對內外展示中國大陸政治運作的法治形式。這樣的設計在維穩、效率與集權統治中具有制度優勢，但在多元參與、公共問責與制度制衡方面則表現薄弱。因此，雖然全人大在法理上具備廣泛職權，其實際在中國大陸政治運作中更反映的是黨國一體的治理結構與制度特徵，而非傳統意義上的代議政治機構。

二、在中國大陸對外關係當中，其領導人曾提出「新型大國關係」，請問何謂「新型大國關係」？請詳細說明「新型大國關係」的緣起、內涵以及中國大陸提出此關係的主要目的？（25 分）

【解題關鍵】

1. 《考題難易》★★★

2. 《破題關鍵》

一、所謂「大國」的定義為何

二、跟西方所謂的「大國」思維有何差距

三、不同領導人所強調的理論，與時空背景有著極強烈的關聯性，課堂上所描述的不同領導人特性、個性，以及在任期間所發生的重大事件，都會牽動所謂大國關係的思維。

3.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美中之間對於大國的思考不一，故整體來說，政策的規劃與發展方向也不一致

4. 《命中特區》

114 年正課講義 pp.6-11、21-22

【擬答】

新型大國關係是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2 年針對中美關係未來發展所提出的重要外交概念，試圖回應在中國大陸國際地位上升與全球戰略格局變動背景下，大國互動應有的全新模式。該構想的提出緣起於中美實力此消彼長、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關切以及歷史經驗中大國之間衝突頻發的警示。隨著中國大陸經濟、軍事與科技的快速發展，其國際影響力顯著增加，與美國在地緣政治、貿易、技術乃至價值觀領域的摩擦日益頻繁。中國大陸領導層深知修昔底德陷阱的歷史邏輯，即新興大國的崛起常引起既有霸權國家的焦慮與敵意，進而導致衝突與對抗。因此，中方提出新型大國關係，目的是希望跳脫霸權挑戰與衝突對抗的

宿命循環，藉由塑造和平共處與合作互利的大國關係模式，穩定中美雙邊關係，並避免陷入類似冷戰的零和博弈。從另一層面看，此概念也是中國大陸外交思維中從韜光養晦走向積極有為的體現，標誌著中國大陸從國際體系的追隨者轉型為規則塑造者，意圖透過理念輸出影響全球秩序的建構。

「新型大國關係」的核心內涵由三大要素構成：不衝突、不對抗強調雙方應以對話處理分歧、避免誤判，防止大國對立升級為軍事衝突。這一立場不僅延續中國大陸長期主張的和平外交原則，也反映出中國大陸在尚未完全取代美國全球霸主地位前對穩定外部環境的高度重視；而相互尊重主張對彼此核心利益(例如兩岸、西藏、南海問題的立場)與發展模式的尊重，這實際上是中國大陸對外關係中堅持主權優先與反對外部干涉的一種外交戰略設計；合作共贏意指在國際政治、經貿、安全與全球治理等議題上推動合作，以多邊主義取代對抗邏輯，達成雙方共同利益。這一理念不僅適用於中美，也被中國大陸逐步推廣至與其他大國(如俄羅斯、歐盟、印度)之間的關係處理中，展現出一種中國大陸希望以自身外交模式擴展國際影響力的戰略意圖。提出這一概念的主要目的在於化解中美之間因戰略互疑可能導致的結構性對抗風險，為中國大陸和平崛起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同時也意圖提高中國大陸在國際話語體系中的主動性與影響力，進一步挑戰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

然而，新型大國關係雖在中國大陸外交語境中被賦予高度正面意義，實際推動過程中卻遭遇不少挑戰與質疑，特別是在如何有效實踐相互尊重的層面中。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大陸所界定的核心利益範疇持保留態度，尤其是在台灣、南海、人權與意識形態等議題上，雙方對何謂尊重存在根本分歧。此外，隨著中國大陸在科技、貿易與安全領域逐步向外擴張，其政策也常被解讀為試圖改寫現有秩序，而非僅僅和平崛起，這使得合作共贏的主張在國際實踐中遭遇信任危機。但因為如此新型大國關係仍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中國式外交的積極形象與制度塑造意圖，是中國大陸從防禦性崛起邁向主動塑造國際秩序的重要象徵，但也揭示了當前世界大國互動中競合並存的現實矛盾。在這樣的格局下，新型大國關係既是中國大陸對外戰略調整的話語創新，也可能因其內涵的不確定與落差而陷入實踐困境。未來該概念是否能真正建立為一種穩定的國際互動機制，仍需觀察其是否能兼顧大國利益平衡、制度共存與全球治理合作的可行性。

三、請詳細說明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為何？並請分析這些意識形態對中國共產黨在執政過程中的作用與影響。(25 分)

【解題關鍵】

1. 《考題難易》★★

2. 《破題關鍵》

一、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的路線變革

二、中國共產黨唯一遵循的政黨意識形態

三、因應時代潮流所強調的變與不變

四、經典考題，可以從課堂上的敘述中，以大方向著手進行敘述，再細部的雕琢，這個課堂上有跟同學講過如何解題的概念，請有效應用之。

3.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一、毛澤東思想

二、鄧小平路線

三、習核心

4.《命中特區》

114 年正課講義 pp.12-20

【擬答】

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體系，是其維繫政權合法性與組織動員能力的核心基礎，自 1921 年建黨以來即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根本指導思想，並在不同歷史階段根據國內外政治與經濟形勢的轉變進行調整與發展。該意識形態體系具有連續性與階段性，從最初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到改革開放後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再到當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構成了中共主導下的指導思想譜系。馬克思列寧主義提供了無產階級革命與共產社會目標的理論基礎，成為中共早期革命鬥爭正當性的來源；毛澤東思想則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初次成果，結合中國大陸實際提出農村包圍城市、人民戰爭與群眾路線，並主張持續革命，深刻影響了中共建政初期的國家發展路線。鄧小平理論的出現，標誌著中共從階級鬥爭路線轉向經濟建設核心，主張實事求是與發展才是硬道理，在維持社會主義旗幟下推動市場化改革，為中共意識形態注入更強的務實色彩。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則進一步調整中共的階級基礎與執政邏輯，將民營企業家等新興階層納入統治聯盟，擴大政黨社會基礎；而科學發展觀則回應了 90 年代末期中國大陸面臨的社會失衡與環境惡化問題，提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為治理原則，凸顯中共政策理念的調適性。習近平上任後提出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則將意識形態再度上升為黨的統治核心，強調黨的全面領導與國家治理現代化之間的結合，提出四個全面、四個意識、兩個維護等指導綱領，並以共同富裕與民族復興為治理正當性主軸，強化政治集中與意識形態控制的範圍與強度。

在中共的執政實踐中，意識形態發揮了多重作用與深遠影響，首先，它是中共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建構來源。透過意識形態的輸出與宣傳，中共將自身描繪為實現中國人民幸福與民族復興的唯一正當力量，透過政治敘事將黨與國家、人民的命運綁定。例如，習近平時期強調中國夢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一步將黨的歷史目標與人民集體意識結合，強化群眾對政權的認同與支持。其次，意識形態在治理過程中具有統合社會與控制思想的功能。中共透過教育體制、媒體審查、網路監管與高校黨建等手段，加強意識形態統一與思想正確性的要求，有效防止西方自由主義、多元價值觀等對體制穩定構成挑戰。在政策推動方面，各階段意識形態提供了轉型的正當性論述，例如鄧小平理論為市場改革開放正名，共同富裕則為當前再分配與社會整合提供道德依據。此外，意識形態亦是中共領導人鞏固黨內權威與實現權力再集中之工具。習近平思想被寫入黨章與憲法，象徵其成為新的指導核心，透過強調政治忠誠與意識形態一致性，對內形成組織動員力，對外亦塑造中國模式的合法性，挑戰西方自由民主敘事。最後，在國際層面，中共試圖以意識形態建構中國話語體系，對外宣稱中國大陸政治體制與治理模式具有效率優勢與制度自信，尤其向發展中國家輸出中國方案，進行制度敘事競爭，拓展其國際影響力。

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不僅是一套政治理論體系，更是其執政合法性、政策調整、組織控制與對外形象建構的重要工具。雖然隨著社會多元化與資訊開放的發展，意識形態的統一性與影響力面臨挑戰，但中共透過制度化的灌輸機制與科技強化的治理手段，仍成功維持對社會的整合與引導。這種將意識形態與國家治理深度融合的模式，是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的重要來源，也使中共在全球政治體系中展現出與西方民主模式截然不同的政治邏輯與治理路徑。

四、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J. Trump) 在其第二任任期上任之後，再度對中國課徵高額關稅，此舉也導致中國亦對美國商品課徵高額關稅，請說明美中兩國面對此貿易衝突各自的立場為何？並分析對美中關係有何影響？(25 分)

【解題關鍵】

1. 《考題難易》★★★★

2. 《破題關鍵》

一、時事題，若未有效搭配講義及時事新聞，則回答將可能有矛盾情形

二、川普第一任期與第二任期的時空背景不同，所採取的方式也有所差異

三、本年度課程強調的美中關係在課程中也有因應時事予以補充相關概念，今年的考題與去年差別較大的地方在於更著重於時事題，若能依安排進行每周時事閱讀，則此題應不會太難作答。

3. 《使用法條》or 《使用學說》

美中在現今局勢下所強調的政策對抗，以及國際局勢所產生的內生、外在因素影響

4. 《命中特區》

114 年正課講義 pp.21-33、總複習 pp.13-19

【擬答】

美中貿易衝突是近年來國際政治經濟中最具結構性意涵的事件之一，其本質不僅限於貿易失衡問題，更深層地反映出全球權力重組與制度競爭的重大轉折點。美國總統川普自上任以來推動「美國優先」的貿易政策，在其第二任期更進一步擴大對中國大陸商品課徵高額關稅，涵蓋電子產品、鋼鋁、農產品與高科技製造品等，總金額達數千億美元。川普政府認為中國大陸透過政府補貼、強制技術轉移、不平等市場准入以及智慧財產權侵害等行為，對美國企業與勞工構成長期性不公平競爭。美國主張以加徵關稅作為經濟施壓工具，迫使中國大陸進行結構性改革，調整其對國企補貼政策、開放金融與科技市場，同時降低雙邊貿易逆差。此舉也代表川普政府將經濟問題上升為國家安全議題，認為遏制中國大陸科技發展與產業升級是維護美國全球霸權的重要一環。與此同時，中國大陸對美國的關稅行為予以強烈反彈，認為其違反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自由貿易原則，是典型的單邊主義與貿易霸凌。中國大陸方面除透過對等報復措施(例如對美國農產品、汽車與能源商品課徵關稅)回應外，也試圖透過強化國內民族主義敘事，凝聚社會支持以應對來自美方的壓力，並加速國內產業鏈自主化與技術自立。

此輪貿易戰對美中雙邊關係產生深遠而多層次的影響，首先，經濟層面雙方互加關稅直接衝擊了彼此出口產業與跨國供應鏈的穩定性，進一步導致企業成本上升、消費者物價波動及市場不確定性加劇。尤其是高科技產業領域如半導體與電信裝備，成為雙方競爭的核心戰場。再者，此一衝突不僅為雙邊經貿對抗，亦引發制度與意識形態的深層對立。美方認為中國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與自由市場體制根本不相容，而中國大陸則堅稱其發展路線具有歷史合理性與制度正當性，雙方對彼此制度的猜忌與防範明顯升高。此外，貿易衝突也加劇戰略層面的敵意與對抗，推動科技脫鉤與供應鏈重組的趨勢，美國不僅限制中國大陸企業(如華為)參與核心基礎建設，亦施壓盟友排除中國大陸技術介入，導致雙邊互信大幅下滑。外交與軍事領域的緊張亦因此升高，台灣、南海與印太戰略等議題成為雙方對峙的熱點。最後，在全球治理層面，美中貿易戰也對多邊主義與自由貿易體系造成嚴重衝擊，WTO 機制的權威性與效能進一步削弱，全球貿易規則陷入碎片化與地緣政治化的風險。

總結而言，川普政府針對中國大陸發起的第二輪高額關稅措施以及中國大陸的報復性回應，反映的不僅是經貿層面的矛盾，更揭示了兩國在權力結構、制度理念與戰略地位上的根本衝突。隨著貿易戰轉向科技、金融、安全與國際治理等領域的全面競爭，美中關係正由以往的互利互補轉型為競爭對抗甚至局部冷戰化格局。在這樣的背景下，雙邊關係日益從合作走向結構性對抗，對亞太地區的安全環境、全球貿易體系及未來的國際秩序均構成長期且深刻的挑戰。如何在此過程中找到有效的競合平衡與溝通機制，將成為未來國際關係穩定的關鍵所在。

公
職
王